

行役尚未已 日暮居延城
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



1942年，勞榦在小方城調查（石璋如攝）

邢義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勞蘇是居延漢簡研究的先驅。居延漢簡的釋文和圖版最早由勞先生出版，他的相關考證和專題論文也開啟了此後研究的先河。勞先生的同輩如陳槃先生，學生如馬先醒先生，都常與勞先生切磋或在勞先生的指導下展開相關的研究。

勞先生的論文多已集結出版。今天的簡牘學者，尤其是治敦煌和居延簡的學者，可以說無不熟悉。大家都熟知的事，無須多談；前輩的成就，以後輩的淺陋去評論也屬無益。以下打算利用史語所收藏的若干檔案、民國七十一年（1982）請勞先生作的一次錄音訪問，石璋如先生的《考古年表》和訪問記錄，談談勞先生如何與漢簡研究結緣以及民國卅一年勞蘇和石璋如先生連袂到居延和敦煌考察的經過。這可能還有些學術史的價值吧。

勞蘇先生的早年

勞蘇，湖南長沙人，1907年生。勞先生高祖勞崇光曾任兩廣總督。祖父勞啓恂曾任工部主事，後赴陝西任同知，家中藏書甚多。勞先生從小有緣飽讀祖父的藏書。父親原在西安任財政廳科員，後來失業。勞先生隨母到山西太原任縣長的舅舅家中生活，進省立第一中學讀書。舅舅原有意科舉，家中藏書也頗不少。據勞先生說，他讀了相當多舅舅為準備科舉而蒐集的資料，對了解晚清的思想很有助益。

大約在民國十四、五年左右，勞先生進北京大學預科，二十年從北大史學系畢業。由於家境清困，在北大讀書期間，無法像同學一樣聽戲遊玩。除上課，時間多花在圖書館裡。曾從胡適、傅斯年（史學方法）、鄧之誠、蔣廷黻（近代史、外交史）、陳垣（史籍目錄）、馬衡（金石學）、錢玄同（音韻訓詁學）等先生問學，更曾在北大和清華聽陳寅恪先生的課。勞先生十分推崇鄧之誠的淵博，自覺從錢玄同先生處獲益良多。除了正課之外，勞先生以閱讀五四運動以來的各種新刊物，接觸新思想為消遣。當時在五四之後不久，校園中對五四的種種主張十分同情，但非全然同意。例如「打倒孔家店」，就不是人人贊同。民國二十年勞先生畢業，歷史系的同學旅行到曲阜，進了孔廟，大家都向孔子像鞠躬。^①

進史語所與漢簡結緣

勞先生畢業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要是得到傅斯年的賞識。傅先生授史學方法論，有二十餘學生，對勞先生的試卷特別欣賞，就要勞先生畢業後到史語所。勞先生因母親須要奉養，史語所待遇太低，先到濟南教了一年書，又到曹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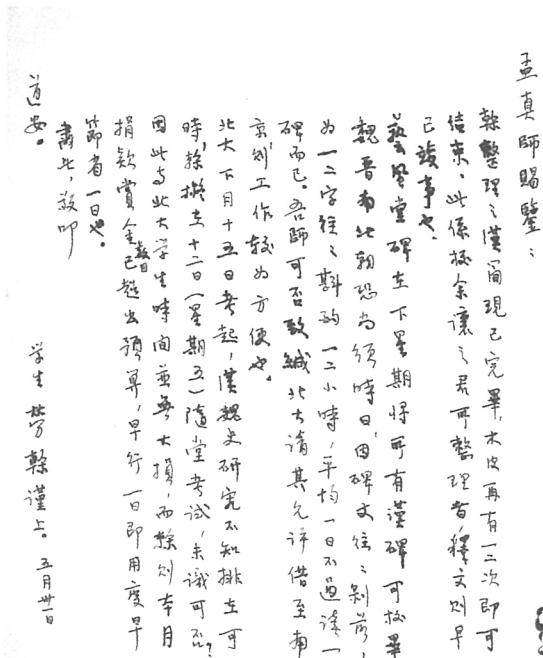
* 本文所附照片由石璋如先生提供，謹此致謝。又本文曾於民國91年5月28日宣讀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主辦之第二屆簡帛學術討論會。今稿附圖及附注略有增刪和修改。

① 以上所記是據民國71年10月29日勞先生在訪問中所作的口述，部分內容見《漢學研究通訊》2:2 (1983)，學人專訪欄，頁91-94。

教了半年，二十一年（1932）冬才到史語所。史語所檔案中保存有一份民國廿二年二月廿一日給勞先生的文件抄本。內容是史語所所務會議通過，勞先生在傅斯年的指導下任研究生。這是勞先生在史語所的第一個職位。當時傅斯年想在史語所辦一個研究所，培育研究生。不久放棄，改和北大合作。勞先生也就在民國廿二年從研究生變成了助理員。因傅先生此時兼任在南京的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勞被調往社會所工作。廿三年，陶孟和出任社會所長，五月勞即北歸，回史語所第一組任助理員。

勞先生投入漢簡工作就在回北平之後。他入史語所的前兩年，也就是十九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鄂濟納河沿岸發現了上萬的漢簡。二十年五月底，這批漢簡運到北平，收藏在北平圖書館書庫。七月開始由劉復和馬衡在四庫閱覽室監督開箱，由傅振倫和傅明德登記編目，展開初步的整理工作。^②劉復身體欠佳，不久過世（23年7月14日），實際工作的是馬衡等人。當時任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北大教授和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對馬衡的工作頗有不滿。勞先生回憶說當時馬衡的進度甚慢，傅斯年覺得須要加快，否則在國際上會失顏面。於是徵得北平圖書館同意，二十二年將這批簡移存景山東街馬神廟松公府的北大文史研究院考古學會。初仍由馬衡和北平圖書館的向達和賀昌群任釋文工作。二十三年北大改組，傅振倫調往故宮博物院，木簡移交北大文學院秘書盧逮曾。此後北大史學系助教余遜和史語所的勞蘇才加入了工作行列。^③當時他們分頭作釋文，各有釋文稿。勞和余的釋文可從現藏於本所的晒藍本釋文稿本見之。稿本有兩冊，兩冊封面都有勞先生毛筆楷書「漢簡釋文」四字。從筆跡可以看出其中一冊釋文為余先生，另一冊為勞先生所作。馬先醒先生曾仔細研究比對，發現當時五人分工，但余、勞二人所釋有不少重複。^④

在釋文完成後，勞先生曾在一封給傅先生的信中略略提到工作的情形。可惜此信



圖一（史語所檔案元6-5）

^② 參傅振倫，〈西北科學考察團在考古學上的重大貢獻〉《敦煌學輯刊》1（1989），頁3。

^③ 民國29年8月25日傅斯年在給袁復禮的一封信中曾回顧當年增人手整理的經過，其中有一段說：「此物出土約十五年矣〔按：應為十年〕。久不出版，學界之恥，國家之恥。先是此物到北平後，即在半農、叔平二先生處。半農下世，叔平自任整理，然彼事忙，迄無就也。十年之後〔按：應為兩三年〕，適之先生以北大為原發起人，甚為著急，于是就北大整理。然整理及排比者實為仲章等，釋文則由三機關委人分擔。北平館委向覺明兄，賀昌群兄，北大委余讓之兄，敝所委勞貞一兄，各成一部分…」（史語所檔傅親筆信稿I-64及油印件I-74(1)）；又參傅振倫，前引文，頁3。

^④ 請參馬先醒，〈晒藍本漢簡釋文中之複出簡及其有關問題〉《簡牘學報》2（1975），頁63-84。

無年份，推定應在二十五年的五月卅一日。信中說：「孟真師賜鑒：榦整理之漢簡現已完畢，木皮再有一二次即可結束。此係校余讓之君所整理者，釋文則早已竣事也。…學生勞榦謹上 五月卅一日」（圖一）釋文工作從二十三年開始，二十六年漢簡運離北平。信中說釋文早已竣事，似應是指勞先生分擔的部分，這部分從晒藍本看共有1267簡（不包括無字、不可釋簡）。❸完成勢須一段時間，因此推測寫信時間早不過二十四年，應在二十五年。信中所說的「木皮」不知何指（削衣或柿？）。按信中的意思，勞先生除作了自己部分的釋文，還曾校讀過余讓之作的部分。晒藍本余先生一冊的釋文裡，的確有不少勞先生動手校改的筆跡。史語所藏有兩人的親筆書信甚多，筆跡很容易分辨出來。例如余遜釋文稿的第一簡10之30，勞即在余釋文「騎將」二字旁重寫「騎將」二字（稿本第1頁）；560之26「氐池」二字，余釋僅描摹字形，勞在旁加注：「（氐？）池」（稿本第2頁）；140之18背面，余於釋文「薪」字旁加「？」，勞改釋為「菱」字（稿本第74頁）；213之25，余釋原作「字跡模糊不可辨」，勞在旁注出釋文「■石□六十三三十八」（稿本第83頁）；340之52余釋作「□里□二」，勞劃去余釋，在旁改作「來馬十三」（稿本第87頁）；116之47原簡左半殘，余釋僅描殘餘筆劃，勞先生在旁注：「掖肩水侯官」（稿本第101頁）。改動較多的如29之10，余原僅釋「河平五年」、「廣地」等字，其餘大部分僅描字形，勞先生在旁重釋數十字（稿本第76頁）。余釋十分謹慎，凡無把握的多描摹字形而已；勞先生則常十分敏銳地釋出文字。余釋文稿共126頁，勞先生的校改僅見於101頁以前，可見沒有完全校完。

二十四年余遜從北大轉到史語所工作。但余、勞二人似乎並沒有完全集中時間在漢簡的工作上。他們在傅先生的指導下讀書，並仍在北大上課。余、勞在廿五年四月七日一封共同署名，由勞先生執筆給傅先生的信中報告工作和讀書的情況（圖二）：

孟真師函丈前奉

賜示敬悉。一切因循至今始覆書左右，深以爲罪。此間工作均在進行。

隨（按：即隋）書標點已畢，現正讀南北史。北大正當春假，現假此時機，進行校碑工作。以六日之力專致力於此，或可較速也。北大圖書館環境尚好，惟往返至少須半小時，且須坐車方能以半小時往返，時間殊不經濟耳。此間現雖正值春假，然日來大風揚沙，竟日不已，然較之嚴冬，亦自有間，閉戶讀書仍有佳趣耳。肅此敬頌

著安

學生

余遜

勞榦 敬上 四月七日

❸ 馬先醒，〈勞貞一先生著晒藍本漢簡釋文中所保存之簡牘形制資料〉《簡牘學報》1（1974），頁59。

當時傅先生在南京。信中所謂「此間工作均在進行」，疑即指漢簡之校讀。到五月底，前引五月卅一日勞榦給傅一信，表示釋文已完成，再一個星期即可校畢北大收藏的藝風堂漢碑拓本，魏晉南北朝碑則還須時日去校讀。除此之外，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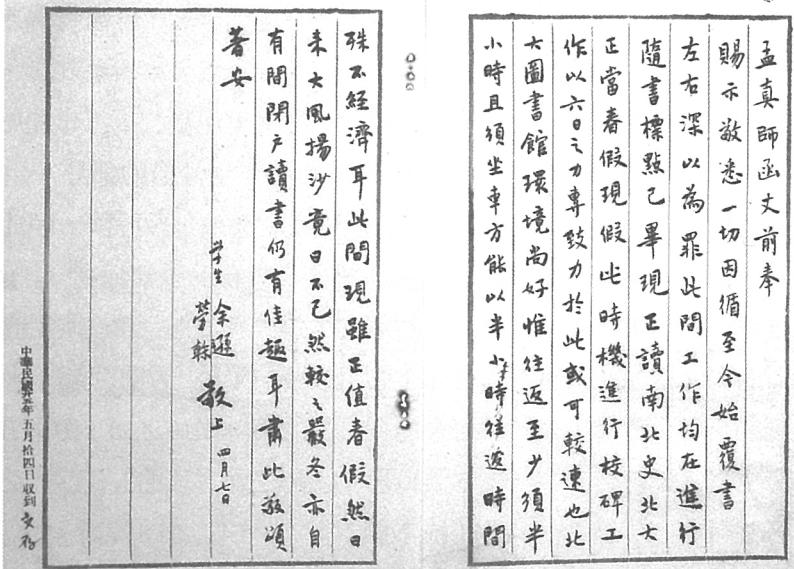
先生在北大上課似還須參加漢魏史的隨堂考試。廿五年下半年勞榦到南京，傅先生又安排勞榦和傅樂煥、全漢昇等人到中央大學聽英文課（元7-15，25.9.7傅致羅志希親筆信稿）。這是傅先生為史語所年青研究人員立下的規矩，一邊工作，一邊須到各大學聽課進修。史語所檔案中有許多當時傅先生交涉人員到北大、中大旁聽及課程、人員名單等文件。

46

令人遺憾的是民國卅二年勞先生出版《居延漢簡釋文》之部，其釋文是根據商務印書館陸續寄到雲南昆明和四川南溪李莊的反體照片，而不是在北平時所作的釋文稿。勞先生在石印本《居延漢簡釋文》之部的考釋自序裡明白說馬叔平、向覺明、賀昌群、余讓之諸先生和他所作的釋文，「因北平淪陷失去」。所謂「失去」，並不是這些稿本都不見了，而是勞先生在準備出版前，沒有這些稿本在手邊。當時怎麼會有晒藍本？晒了幾份？這些晒藍本又怎麼會藏在史語所？至今仍不是十分清楚。^⑥

敦煌、居延考察之旅

民國卅一年春，中央研究院與中央博物院、中國地理研究所合組西北史地考察團，計劃在陝西、甘肅、寧夏和青海一帶從事考古、歷史和地理的調查。據石璋如先生回憶，當時有一股西北熱，政府和民間有不少個人和團體到西北各地考察。^⑦于右任和張大千都是著名的例子。相較而言，西北史地考察團的目的較為嚴肅。中國與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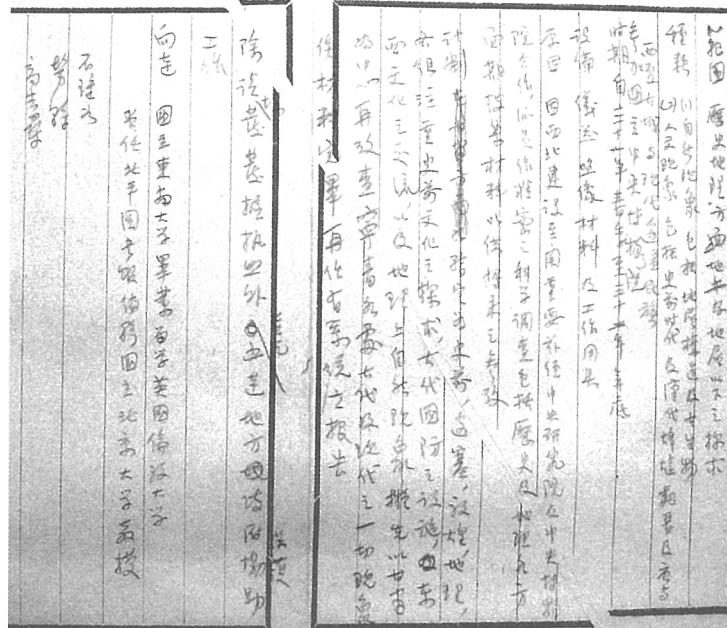
圖二（史語所檔案元6-4）

⑥ 馬先醒先生曾提到勞、余二人將釋文「原稿交北京大學，而自留一底本，即晒藍本漢簡釋文」，見〈余讓之漢簡學〉《簡牘學報》1（1974），頁12。如係自留晒藍底本，為何勞先生在昆明時只據反體照片，無底本可以參考？並在自序裡謂原釋文失去，根本不提晒藍本？一個可能當然是勞先生未帶晒藍底本到昆明去。但晒藍本後來為何又會在本所出現？其中過程仍有不明。

⑦ 參陳存恭、陳仲玉《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頁251。

古今論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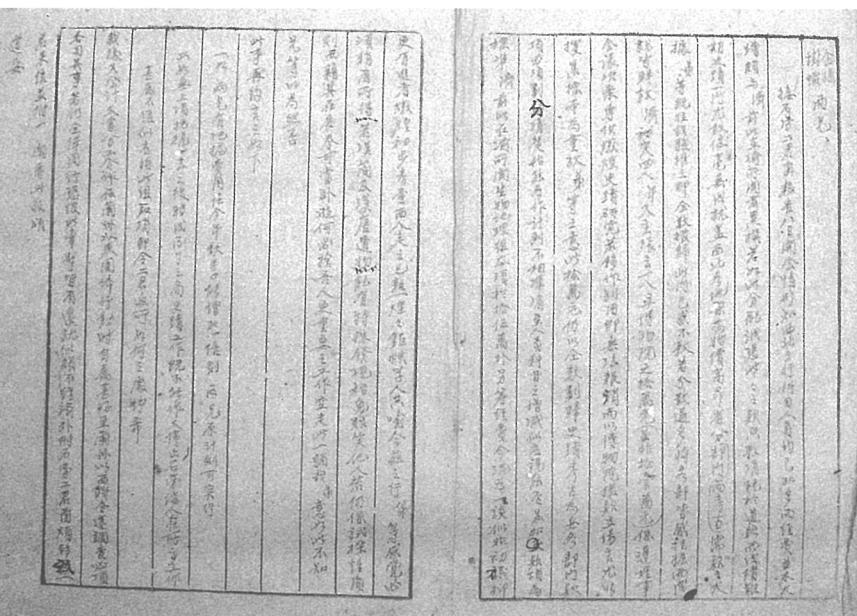
典學者於民國十九年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之後，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學者自組考察團隊在西北地區進行科學調查。傅斯年基於民族自尊心，一直希望建立一支合乎近代科學方法的學術研究隊伍，將東方學的主導權自巴黎拉回中國。他更希望藉由科學方法找到新的材料，驗證當時由許多西方學者所提出有關中國文明起源的種種新說。



圖三 (史語所檔案李38-1-3)

據勞先生一份親筆的計劃草案，西北史地考察團分為（1）歷史考古和（2）地理及動植物兩組。計劃中勞蘇、石璋如、高去尋和向達屬歷史考古組。預計自卅一年春至卅二年年底，調查包括地層構造及古生物之自然現象，史前時代、漢代烽燧、魏晉、唐、西夏古城與現代邊疆民族等人文現象，「注重史前文化之探求，古代國防之設施，東西文化之交流以及地理上自然現象。擬先以甘肅為中心，再攷查寧、青各處古代及現代之一切現象。」（圖三）勞先生在計劃中所說的史前文化的探求和東西文化交流等項目即和傅斯年所關切的問題直接相關。

民國卅一年中，滇緬公路切斷，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中央研究院經費極為拮据，傅斯年認為經費過少，計劃太大，組織不周全，倉促成行，難有所成，一開始並不贊成考察團的計劃。他在得知計劃內容後，四月十五日和副所長李濟由重慶合寫一信給計劃中的考



圖四 (史語所檔案李3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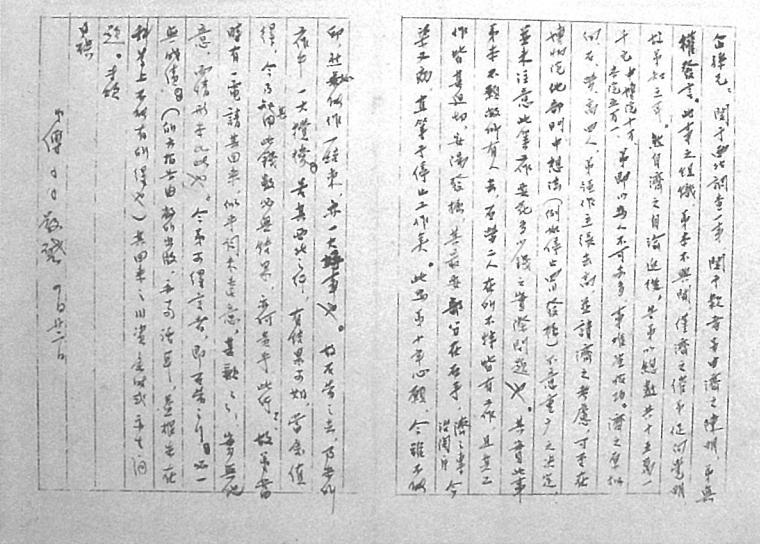
察團團長辛樹幟（原西北農學院院長）和中研院總幹事葉企孫。在信中，傅先生有這樣幾句重話：「更有進者，燉煌初步考查，西人走之已熟，煌煌鉅帙，學人共喻。今茲之行，弟等感覺必須稍有所得，若漢簡及漢唐遺物能有特殊發現，始免貽笑他人。若仍係試探性質，

則西籍具在，展卷可當臥遊，何必捨吾人更重要之工作，空走此一趟哉？」（信件抄本，圖四）信中並謂如經費不能增加一倍，則要石、勞二君回所，免得耽誤原有的工作。傅先生在四月廿二日給葉企孫的另一信中，更明確表示不願史語所的人員放下手邊的重要工作去西北虛幌一趟。如不得已非去不可，也要減少人數，建議刪去高去尋。信末十分悲觀地表示：「今弟可得言者，即石、勞之行，必一無成績！」（那廉君手抄信稿，圖五）

48

不論如何，石璋如和勞榦在民國卅一年四月還是從昆明李莊出發，踏上西北考察之旅。石、勞根據傅先生的要求，沿途寫信報告工作情況。這些信編有序號，稱報告第一號、第三號、第四號…，大部分用複寫紙複寫，正本存底，複本寄給傅先生。奇怪的是沒有報告第二號，但有石璋如給傅的一信，在時間和行程上恰在一、三號報告之間，可以視為第二號。或許當時忘了加上序號。除了這一封，報告都由兩人署名，勞先生執筆。報告前後九份，目前完整保存在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從這些報告，不但可以知道二人工作情形，也可以證明傅先生原先太過悲觀了些。在九份報告之外的另一封信裡，石、勞曾評估西北地區可以進一步進行的工作項目。石、勞的考察和提出的評估應曾多多少少促使傅先生於民國卅二年又組織了一次西北調查，以向達和夏鼐兩先生為主，並獲得了更多的成果。以下先根據石、勞的九份報告和石璋如先生來台後所編《考古年表》（民國41年9月，專刊之35），略述二人在敦煌和居延考察的經過。

勞榦和石璋如是民國卅一年四月一日自李莊出發，經瀘州，於二日抵重慶，並在重慶發出第一號報告。他們到重慶主要是購買藥品並安排往蘭州的車輛（第二、三號報告，李38-3-2、3）。第四號報告寫於五月五日抵蘭州之後。他們乘油礦局的車於四



圖五（史語所檔案李38-1-7）



圖六 (左起) 石璋如、勞蘇、鄒道龍、雷震攝於莫高窟C243窟

月廿一日從重慶歌樂山，經內江、成都、梓橦、廣元、褒城、雙石舖、天水、華家嶺順利於五月四日到蘭州。報告中提到「沿途除通渭之碧玉鎮外，沒有發現一處遺址。褒城、漢中雖亦有黃土，是否有彩陶遺存尚是問題。天水北之皇城，陶片滿地，屬漢以後遺存。」（四號報告，李38-3-4；石璋如《考古年表》頁102石先生手書補充註記）從他們乘車趕路的行程可以知道，以上所說僅是很一般的觀察。

較重要的是五月廿六日發自酒泉的第五號報告（李38-3-6）。在這個報告裡，石、勞了解到一些居延的情況，有了初步赴居延的想法：

由酒泉至安西，據云時有哈撒出現，故馬車不敢坐。為安全計，必坐汽車。但候車須要若干時日。酒泉已由中央軍接防。據云由居延調來，由肅至居路尚平靖。擬敦煌工作畢赴居延一行。待計劃固定後再奉聞。由涼至甘尚有長城遺跡，由甘至肅，除少數地方有水草，大都為沙漠…

所謂「哈撒」即其他信中所說的哈薩，指哈薩克人。當時甘肅一帶並不完全平靜。勞、石二人在另一封給傅先生的信中提到「甘肅地面近來大體平靜。惟南山寇盜出沒無常，萬佛峽、陽關、西千佛洞諸地必須請求軍隊保護至相當數目，方敢前往耳。」（31.5.20石勞致傅信，李38-3-5）

石、勞二位於六月十五日抵敦煌，可巧張大千也於同一日帶「青海番子畫匠數人」抵此臨摹壁畫（報告第六號，李38-3-7）。石、勞在敦煌的工作情形雖與漢簡無關，但事後證明他們在這兒測繪石窟，意義十分重大（圖六）。1996年石璋如終於將測繪的結果整理出版成三巨冊《莫高窟形》，極獲好評。這可以說是他們這次西北考察最具體的成績所在。以下將報告第七、八號全文逐錄如次（李38-3-8、9）：

孟真先生鈞鑒：

十五日到達敦煌以後，十六日休息一日。十七日赴城南十里之月牙泉。此即相傳渥洼天馬所出之地。元和志曾記此地。然廟宇皆清代所修，規模尚大。

池北即鳴沙山，高出泉水約一百公尺，自山頂滑沙而下，則沙因摩擦而鳴，一二人自山上而下，仍不鳴也。山因風向及地形之關係，風自山峽入，輒吹沙上升，不致塞泉，亦非相傳所謂沙能自上也。自敦煌出城五里至廿里以外，即古戈壁灘。到月牙泉五里外即是戈壁，經一小水草田又到沙山。據縣志云，舊三危山曾積雪，然自道光修志時已無雪，雪線上昇，水量漸少，漸成沙磧，乃不可避免之事。

十六日曾在敦煌城四圍觀覽。敦煌城經黨河之灌溉，溝渠交錯，綠樹參差，田疇豐美，儼然長江流域。其民多自甘肅各縣徙來，故五方雜處，民情刁薄。黨河西岸為故漢郡城，城垣大部尚存，城內則完全開墾，無復遺跡可尋。

十七日午後自城內出發，多經沙磧，車行甚緩，次晨（十八日）達到千佛洞。千佛洞共有兩喇嘛廟，一道士廟；喇嘛廟稱為上寺及中寺，道士廟即著名王道士所曾居者，稱為下寺。璋如及榦住在中寺，張大千則在上寺，教部藝術團，亦在中寺。張大千雇有喇嘛能畫者及畫匠八九人，大批臨摹。藝術團僅來三人臨摹，聞藝術團準備住二、三月，張大千則無限期也。

敦煌壁畫始自北朝終於元代。從題識及殘存有層次者推斷，大致可以決定。蓋用筆及著色均有不同，比附觀之甚為明顯。尤以北朝及唐代之鴻溝更為顯著。此或因隋氏平陳以後，南士多來雍洛，當時經學書法趨尚南朝，繪畫應亦受其影響也。現在北朝繪畫片楮不存，則敦煌壁畫可稱瑰寶。

現在之工作為第一步測量一準確之千佛洞全圖。現在對每洞之結構均詳加測量，蓋此項工作素無人做。伯希和之圖亦非常簡陋，不足以為科學上之根據。其他諸人更不足論。至於伯希和之照像，所注重者似只是題記一項，並無若何道理，可補充者甚多。至於紀錄一項擬分為洞內結構、塑像、壁畫（佛教故事及圖案），對每洞之特點各作一詳細紀錄，然後再作一比較，從各部分之特點，斷定其時代及其對於歷史之關係。

千佛洞自遊人不斷取攜，現已寸帛片紙無存。聞從先縣長郭曙南曾命紳士所藏經卷歸縣保存，交卸以後竟無蹤跡。又二十五年英人巴慎思盜壁畫十箱被截留，交縣保存，現在亦不知下落。又聞下寺住持李道士云，殘餘番經尚有一捆，為前縣長王會文要去，現亦不知下落。

千佛洞完全為新生代之礫巖，山之成功距有史時代不遠，尚未結緊，故不能雕佛。（據探礦隊說）石質甚壞，常易崩塌，現在塌壞之事，年有所聞。苟不加以保存，前途不堪設想。又宋代前廊木構計有四個，此間歷來無人注意，現其中兩個已危在旦夕。幸此間無雨，若在四川，早已塌壞。至於壁畫更時常脫落，無從稽核。此事若交地方保管，則官吏無非五日京兆，恐更不如僧道。

若交學校保管，則有歷史有基礎之學校，不見得肯到此處。新成立之學校，基礎未堅，難言付託。譬如前某藝校，改組之際，書籍全被私人瓜分。若以重要國寶，付託一未知前途之學校，前途之事，誰來保證。唯有有基礎之博物館在此成立分館，作長期之計劃，負修理及保管之責。任務專，軌道可循。庶幾不致如學校設立，簡單則人亡政息，複雜則前途難料。且普通學校不便『兼差』。藝術學校，則古物保管係專門學問與藝術分途。況學藝術者個性皆強，國內無一藝校無潮，又豈是保存古物者爾？此意未知可供參攷否。

現在天氣甚熱，沙漠日中一百二十度(F)，現在旅行多在晚上。故陽關（距敦煌一百六十里）疏勒河烽燧（最近者八十里）皆無法前去。且哈薩仍未肅清，將來前去亦須多人保護方可。擬秋涼再為斟酌。

肅此，敬頌

道安

學生 石璋如

勞榦 同上 六月二十二日

第八號報告寫於卅一年八月十一日，在前一報告的五十天以後。勞先生在報告中說：

孟真先生：

璋如及榦於七月十八日赴敦煌西湖，往返八日；於七月三十一日赴南湖，往返十日。西湖當疏勒河下游所成之沼澤，當古玉門關故道；南湖沿南山而行，當古陽關故道。

此次出發因縣政府接得報告，新疆軍隊及蘇聯人到敦煌境內窺測，並俘虜敦煌人民。又西湖之土葫蘆地方及南湖之多壩溝地方，聞有煙苗，故縣政府派警會同軍隊前往。西湖、南湖俱哈薩出沒之地，平時絕無法前往，即為工作而請軍隊，敦煌駐軍僅有第五師東干軍兩連，亦不易請到。因此與敦煌縣長商酌，隨同前往。計軍隊副官一人，排長一人，兵四人。縣政府警佐一人，警士二人，黨部幹事一人，均有槍械。此外尚有商會代表一人，嚮導一人。共計十四人，並備十四馬，被褥均置馬上，另攜小帳篷一。

十八日下午六時半起身，行二十里宿離巴闡，此為敦煌沙漠田西北盡頭處，此行僅此處有人家，再西行則為草原及戈壁矣。十九日經戈壁約五十里至頭道泉，始有蒙古牧羊人，其位置約當斯坦因之Yantak Kaduk Spring處，更經一戈壁，約行三十里至南泉附近，始見烽台（或是T23）。試掘其周圍，但蘆葦而已。午後遇雨，即支帳篷在此住宿。

二十日早仍陰雨，自南泉行五十里至酥油沱。沿途多是草原及沼澤，但有

牧羊人者僅南泉附近之東灣、西灣及酥油塚東五里之香爐墩而已。（香爐墩乃一天然石墩，非烽台）。至酥油墩後，即在滿地羊糞之地上鋪行李休息，燒乾牛糞及乾紅柳為飯。幸天色已漸晴，否則狼狽不堪矣。更行四十里穿低山中至大方盤，即斯坦因所記倉庫之遺址。此時軍隊早已前行，無法停留，僅能觀其大致而已。更上一坡，便成戈壁。行三十里至小方盤。即古玉門關舊址。城每面僅各八丈，有西門及北門。其照片曾見於Serindia（從西南望者），及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從西北望者）。地形開敞，其城二、三十里以外即可望見。軍隊中以為此乃俄人及哈薩行蹤常及之地，不便久留。飯後仍西行。天已傍晚，約行廿餘里戈壁，即到澤中，四野狼號，人馬股栗。乃北行覓一山坳過夜。露宿其處，未支帳篷，各牽馬韁，未敢熟睡。

二十一日未明即起，約行五六里至後坑（後坑距小方盤三十里）。未停，經戈壁約七十里始至大澤中，其地在玉門關西南，（當為T5附近）。更南經一烽台在山巔（或是T6a，大澤地名麻密陀）。向南行三十里即到土葫蘆，南為土山，北臨泉水，下有煙苗，但已旱無人跡矣。土山上有烽台一（或是T6b），在其附近兵房甚顯，然皆已掘過，試掘數坑，僅得片帛。是日仍東返，宿戈壁中。

二十五日回至敦煌城。

此行因隨同軍警前往，故所經烽燧多未及詳為發掘，蓋沿途自酥油塚以西，已久無居人（從前有不少蒙古人，近皆逃走）。且沿途皆為俄人及哈薩出沒之危險地帶，軍警實力不厚，亦無法勸其久停也。

回後即擬前赴南湖，因縣政府未準備好，故遲至三十一日方始成行。下午自城出發行二十里，經南台村後入戈壁。惟傍山一線，略見灌木。天色漸晚，浮雲四起。沿黨河南行，在戈壁中一小店休息，其下即西千佛洞也。此時未及前往。一日早五時到達南湖，有二百餘戶，為敦煌大鎮。近因哈薩紛擾，損失甚鉅，方在修堡寨中。下午二時更西行，當晚共行四十餘里，露宿戈壁中。

二日早未明即出發，約行三十里至雀毛塚。其地為沙山中幽谷，溪水自南向北流，有人家約七八家。谷西通多壩溝，即此行目的地。西南行經安南壩，葫蘆斯台等處，為至新疆必經之地，但向南早已無居民行跡矣。谷南口有二烽台，隔溪相對，形勢甚壯。東面烽台踞小山峰上有一小城，每面約二十公尺。惟城牆已破，復依山為壘，至不整齊，故未能詳測。按陽關地望久無所定，清乾隆帝謂在南湖之紅山口（南湖北約二三里）。清光緒時縣令汪宗翰則立碑於村中舊壽昌城中。據元和志在壽昌城西六里，則似在舊漢時龍勒故城舊址。斯坦因到此亦未曾確定。然無論何地，均可繞越。惟雀毛塚故壘則形勢險要，玄

古今論衡

獎出關，關卒曾射二矢，是否此處，尚宜詳核也。

三日更西北行七十里至多壩溝。原有居民，近僅六人在此耕種。遠望見有人馬，即行逃避，到後已無一人（其中有由間道逃至雀毛塚者，歸後方見之）。亦是一山谷，谷東亦有烽台，惟山經風蝕，已至難上。蓋皆通西湖要道，雀毛塚正對小方盤，多壩溝正對麻密塚，皆可從戈壁北行也。此日仍返雀毛塚，四日返南湖。

六日、七日在南湖發掘二日。計爲紅山口之烽臺，壽昌古城，龍勒舊城，均無所得。僅在龍勒遺址得門楣門框各一。或是唐物，未敢遽定也。六日又發掘紅山口北遺址，在戈壁中，窺其大略，似係考試故場，得古磚數塊，土人稱爲陽關磚者，然無文字，未能斷定。九日返城，道經西千佛洞，故有洞百餘，今俱沖壞，僅餘六個。壁畫大體仍是六朝，惟粗甚，不如千佛洞，無多可取。九日仍返城。十日下午自城返千佛洞。

此行歷南湖及西湖，凡二十餘日，惟在南湖遇一老人，年七十八矣。云：斯坦因在西湖凡三月之中，共用纏回十餘，漢人二十餘。所掘一無所獲之處甚多。今所經歷多爲彼已掘之處，且治安、工人、馬匹俱成問題。未能獲得古物，自在意中。惟希望爲敦煌烽燧初步之探討而已。

專此敬頌

道安，

學生 石璋如

勞 載 同上 八月十一日

53

兩件報告反映了當時治安和人手上的困難。他們無法從事發掘，一方面是人手不足，一方面也因爲軍隊無力保護，無法久留。真正有價值的工作是詳細測繪了千佛洞石窟。從後來石璋如先生出版的《莫高窟形》一書可知，當時他們不僅測繪，還拍下了四十餘卷，四百餘張石窟結構和壁畫的珍貴照片。照像一事在第九號報告中也曾提到。勞、石在一封九月廿六日未加序號給傅先生的信中，一方面提到西北未來可進行的工作，一方面也確定在千佛洞工作之後，到居延去調查：

孟真、濟之先生大鑒：

千佛洞的工作業已告一段落，同時爲著趕搭礦局的最後一次車（因油礦局燉煌辦事處結束，此車是接人員返礦）。所以于九月廿二日早離開敦煌，廿四日抵關，預備三、五日內赴居延。十七日廿三個汽車送中央軍（四八師）一營到燉煌，現與馬家隊伍（？）月駐那里。原是一百汽車送一團到安西的，該團的鄉團長來游千佛洞，與之同返安西。他介紹曾駐居延的夏團長（現駐玉門）一談，夏又介紹該部陳營長（現駐二里子河）。據云路途平安，不過氣候冷點。先是農林部西北視察團以一月零三天的工夫曾往返于居延一帶，據云可往

一行。有此兩重關係所一〔以〕決定離千佛洞到居延去。至於向先生來燉未成問題。早已與陳縣長說妥，而且藝文考察團盧善群尚在千佛洞，與中寺喇嘛相處甚好，故食宿及其之〔它〕一切不成問題。不過千佛洞開始冷了，早晚均須棉衣。陰曆九月底即凍冷。若再遲，來年恐不能工作。生等月餘來千佛洞工作，詳另報，餘不贅。

以下談今後的工作問題。因來西北之不易，而工作僅作一小部，且最近將有〔來〕如機會來臨，故擬具數項，望垂察焉：

- 1.隴南調查彩陶 彩陶的蹤跡在關外三縣從未見到。疏勒河流域無此種文化遺存，所有的大半是繩文陶片及灰色光白陶片。中國式的彩陶是否西起青海及隴南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且彩陶遺址中是否有黑陶的成分，更是不得不前往一視。安特生所挖者都是墓地，不能窺出與其他文化的關係，究竟是純彩陶文化或另有其它堆積也是急待解決的問題。齊家期如果真早於一切，這個問題太有趣了。這是決定中國史前史的最重要的關節，絕對不可放鬆。而且生擔任的是史前組，所一〔以〕想往隴南一行。
- 2.新疆調查近來中央軍入疆的聲浪甚高，不久將成爲事實。前哨已到安西。果然，則新疆不可不去。更□不〔？〕爲本院西北考古豎一基石。袁先生平中雖有許多新疆的材料，但未發表，均在不知之中。新疆在中西交通上太重要了，安肯輕易放過。
- 3.陝西銅器時代墓地之調查本所殷代及戰國時之銅器雖爲數不少，但西周墓器確〔卻〕附缺如。行世之西周彝器爲數雖多，但無確定之出土地點，無地層及部位之根據，而不能作頭等之材料甚爲可惜。倘能在陝西境內作有系統之發掘，不但可爲已出土之西周器物之助，更可補殷商殘墓之不足。目前固然不能發掘，但調查工作絕不可少。預先作精準之調查，則抗戰結束後即可從事發掘。固然陝西北平研究院有優先權，不免在合作的條件下進行，實際上他已無形放棄了。
- 4.寧夏舊、新石器時代調查由此次玉門陽關等處的調查，知道繩文陶器在漢代尚大是〔量〕的使用，不能把有繩文陶片的遺址都當作先史時代。所謂寧夏的舊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是否也有漢代或較早一點的可能，很希望親眼看之，來解決這個問題。本所調查更到綏西的五原，倘能往寧夏一查，則西北的輪廓可以完成。
- 5.漢水流域調查【這一個地帶從（按：這六字左側加圈，似寫後又刪去）】漢水流域還是考古的處女地。西北聯大雖設立城固，但未聞有何發現。早年究竟受何種文化所支配不得而知，或者是另具型態的一種新文化也未可知，很值得前往一視。

6.陝東南及豫西一帶調查 這一個地帶從前號爲匪區，很少調查者的蹤跡。現在河南省政府設盧氏，向商南等處又爲陝豫交通的要道，不如趁此機會前行調查，或有新的出人意料之外的發現。中央軍入疆，意在南疆築路，築路時尚有很多古物發現。希望中央博物院或者派人前往隨時調查。因爲敦煌附近的玉門關、陽關均不能發掘，而居延也因氣候的關係不能久留。預計尚有餘款。以上6個調查〔的〕均甚重要，但以少數之餘款決不能完全完成。餘款確數現尚不可預知，須由居延歸來，始可奉聞。所帶儀器均爲最輕便者，可是在目前的交通條件下，猶嫌其笨重。費巨大力量將其運來而諸多工作尚未著手，又將其運回，在儀器受顛波的振動，在公家受運輸之勞，這種雙重的損失，確是太不值得。倘能以蘭州爲西北考古的中心，覓一場所派人駐守，不但儀器等可以不運四川，而西北工作可以從此豎一基礎。擬將紀錄儘短時間整理完備，在張大千諸人以前出版，再定行動。如陝西或新疆能作時，仍希望能作。生榦願於居延工作完結後，即返李莊；生璋如願於居延工作完結後轉行隴南。究竟如何辦理，請撥冗賜示爲禱。專此敬請

撰安

學生 石璋如

(以下附言，略)

勞 榆 全 上

31.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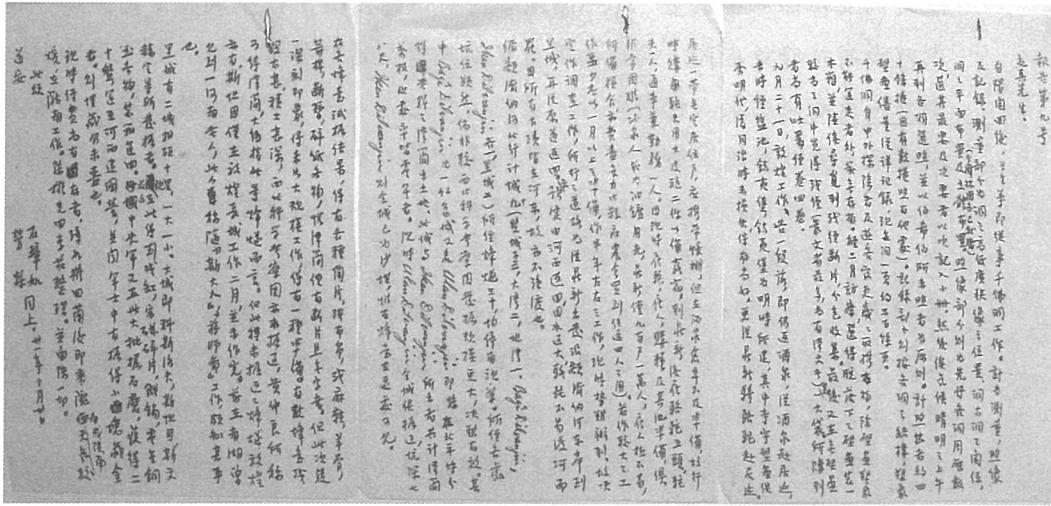
信中提到向達到敦煌一事。原計劃中勞、石、向爲一組。出發時卻只有石、勞二人。這是因爲向達代表北京大學參加考察，當時他在西南聯大任教。向先生爲了安頓家眷，手續和經費上又多周折，遂至遷延。向達在一封六月廿九日給傅斯年和李濟的信中說，他曾接到石、勞二人的信，並表示希望能在七月啓程赴甘肅（李38-2-15）。結果實際上九月廿五才到蘭州，十月一日在武威發信給傅云，希望五日到酒泉時「勞、石二兄尙未北行可與會合同赴居延一帶」（李38-2-8，十月一日向致傅信）。結果五日向達趕到酒泉，勞、石二人已於十月一日離酒泉，踏上居延之路（李38-3-22，勞先生親筆工作報告，日期不明）。

第九號報告（圖七）是石、勞寫於自居延返回之後。信中除了述敘在居延所見，也簡略說明了去居延前後工作的情況：

孟真先生：

自陽關回後，學生等即從事千佛洞工作。計爲測量、照像及紀錄。測量部分爲洞之高低廣狹，像之位置，洞與洞之關係，洞之平面布置及立體布置。（分圖、總圖各以就緒）照像部分則爲先將各洞周歷數次，選其最要及次要者，以次計入小冊，然後俟氣候晴明之上午，再到各洞選照，並以伯希何所未照者爲原則。計照出者約四十餘捲（因有數捲照有他處）。記錄部分則按各洞

古今論衡



圖七 (史語所檔案李38-3-12)

之結構，塑象、壁畫儘量從詳記錄。現每洞一頁，約三百餘頁。

千佛洞自中外探險者及遊客官吏歲歲取攜古物，除壁畫塑象不能運走外，幾無存物。經三月訪察，選得脫落下之壁畫，裝一木箱。並陸續尋覓到殘經斷片，分包收集。最後又在無壁畫較高之洞中覓得殘經（蒙文者最多，尚有漢文者裝一大袋。）所購到者尚有吐番經卷四卷。

九月二十一日，敦煌工作告一段落，即仍返酒泉。從酒泉赴居延，當時經鹽池，鎮夷堡，鎮夷堡為明時所建。其中寺宇壁畫俱屬明代。清同治時未損失，保存尚好。更從鼎新騎駱駝赴居延。居延一帶無定居住戶，應攜帶帳篷，但在酒泉倉卒不及準備，故行時購駝夫用大皮袍二件以備露宿。到鼎新後雇駝五頭，駝夫一人，通事兼勤務一人。因現時雇駝、雇人、購糧及其他準備，俱非常困難（酒泉人幾為油礦用光，鼎新僅九百戶一萬人，雇人極不易。所備糧食亦費盡氣力由縣府農倉買到往返四人之用）。若作較大之工作，至少應以一月以上之準備，作半年左右之工作。現時勢難辦到。故決定作調查工作，所行之道路為從鼎新出發沿額濟納河東岸到黑城，再從原道返回。原預定由河西返回，因水過大，駝駝不易渡河而罷。因所有古蹟皆在河東，故亦不強渡也。

沿額濟納河北行計城十（雙城子三、大灣二、地灣一、Bagê Dilvanjin、Iken Dilvanjin各一、黑城二），所經烽燧三十，均停留視察。所經各處坑位顯然，倘非較西北科學考察隊發掘規模更大，決難有效。其中Bagê Dilvanjin為一紅色城又名Ulan Silvanjin，即榦在北平時分得考釋之漢簡出土地。此城與Iken Dilvanjin所出者共計漢簡萬〔枚？〕，他處率皆零星者。現時Ulan Silvanjin全城俱掘過，坑深七八尺，Iken Dilvanjin則全城已為沙埋，惟石烽臺在遠處可見。

在各烽臺試掘，結果得有各種陶片、殘布帛、殘繩鞋、羊骨、箭桿、斷簪、

碎紙各物。惜漢簡僅有斷片且無字者。但此次獲一深刻印象，將來如大規模工作，得有一種準備。有數烽臺殘毀太甚，積土甚深。西北科學考察隊亦未掘過。黃仲良所稱可得漢簡，大約指此等烽燧而言。但此種未掘過之烽燧，敦煌亦有。斯坦因僅在敦煌長城工作二月，並未做完。前在南湖曾見到一河南老人。此人自稱隨「斯大人」、「蔣師爺」工作，頗知其事也。

黑城有二城，相距十里，一大一小。大城即科斯洛夫，斯坦因、斯文赫定等所發掘者。現在此得到殘缸，宋磁碎片、鐵鍋、零星銅□各物，裝箱運回。最近中央軍又在此大批掘石磨，獲得二十盤，運至河西建國營，並聞軍士中有掘得小塊藏金者，則埋藏仍未盡也。

現時經費尚有存者，璋如攜回蘭後，即乘隴南或陝南天氣較緩，在隴南工作。幹擬先回李莊整理，並面陳一切。

此頌

道安

石璋如

勞 穀 同上 卅一年十月卅日

報告中所謂的Bagê Dilvanjin即小方城，Iken Dilvanjin即大方城。這件報告完全沒提他們何時從酒泉到居延，也沒有說何時結束居延的考察。據十月二日傅斯年收到石、勞十月一日自金泉發出的一封電報云「到肅即赴居延」（李38-3-11）。所謂「到肅」是從敦煌千佛洞到肅州，也就是酒泉。可見他們從千佛洞到酒泉，沒有耽擱，十月一日當天即又從酒泉出發，開始居延之旅。他們考察的路線是從酒泉沿著明長城邊上的鹽池、鎮夷堡，沿河北上鼎新（毛目），再出長城沿著額濟納河東岸北上（圖八）。1930年貝格曼等人從肅州到毛目也走鎮夷堡這條路。^⑧



圖八 勞穎在鼎新出發時，騎駱駝的照片（石璋如攝）

^⑧ 可參沈明得譯，〈貝格曼在額濟納河地區的考古工作（選譯《蒙新考古記行》）〉《簡牘學報》17（1999），頁177-181。

石、勞的這份報告僅非常簡略地敘述在雙城子、大灣、地灣、大小方城和黑城所見的情形。石先生在民國四十一年出版的《考古年表》中則有稍微詳細的記述。《考古年表》為非賣品，他們沿途考察的記錄也從未正式發表。原表表三〈調查諸遺址之位置及蘊藏表〉為表格形式，各調查遺址前有編號，依次有遺址名稱、所在省縣及遺址所在地、調查者、調查年月及蘊藏摘要等欄。以下遙錄表三之「所在地」和「蘊藏摘要」的部分，作為補充：

332甘肅鼎新雙城子

在鼎新北。此地尚有漢人居住。再北行一日為漢蒙交界處有蒙人居住。由此以北為蒙古界牲口柴草均不准過此。由此前行即可見蒙古包了。

有大小二城，小城在北，內外兩層，內城約為30公尺見方，牆厚約5公尺，高約6.5-7.0公尺，階坡在東北角。東門杜塞，南門高寬均2.5公尺，外城東西56公尺，南北43公尺，門居中，高約2.0公尺。西南角則缺一塊，計東西14公尺，南北11.0公尺。內城之外，牆距外城之內牆為5.5公尺，內城有建築遺跡，據云為同治年間避回亂而築，不知可靠否。外國人在其中掘一木簡，其上朱書一公字，我在其中挖一唐代陶片。現在城外為鹹灘不可耕種。

大城在南，二者相距約一公里，現為農田，其城南北約360公尺，東西290公尺，由中牆起分為南北二城。北城，南北長170公尺，所遺短牆高約1.5公尺，長約60公尺。由此牆分為兩城，故曰雙城子。當年僅有南北二門，現在的東西缺口，係人工毀壞的。據云為明代所築，但北牆附近埋有大量繩紋陶片。保長李應唐云于清代時，曾掘一墓，其中有四長頸瓶及一銅鏡，按此墓非漢即唐，其處為通二里子河要道，有漢唐遺跡當不成問題。

333甘肅鼎新大灣城

在雙城子東北。現無人跡，由其環境觀察，當年可能為屯墾之所，因距水甚近，黑河之水可用以灌溉，且地下有黃土，或即當年之農田。

城緊臨黑河，河水繞其北，西兩面，由地下之遺存及其殘牆可分為三個時代。最早為漢代，東牆殘痕長320公尺。東南角有一墩方50公尺，高80公尺。頂稍尖，中有門，高不可登。西北隅近河邊處尚有一殘墩，並有一房基，此城之東南隅，地下滿布繩紋陶片。在此大城之西北隅有一小城，其東牆距外牆為200公尺。該城東牆南北長164公尺，居中有一墩，北牆東西長93公尺，西牆一墩，南牆93公尺。西接小城外壅，惟西牆缺，在此城之地面上滿布唐代陶片。

居大城的中心，略近河岸處有一小城尚完整。南北長77公尺，東西寬67公尺，南北二牆各有一缺口相照，西牆偏北處有一小墩，方約3.公尺。內有一坡可上下城。西南隅有一大墩，下方14.0公尺，上方10公尺，高8.0公尺，與城等高，城牆厚約1公尺，高約8公尺，城門向東門寬6.0公尺，深125公尺，門內北邊有台階可上城。東門外有一小壅城，東西寬17.0公尺，南北長32.0公尺。城內正中為房基，面對東門，在此城內之地下滿布黑磁片，為西夏物，故此城當為西夏城。由此可知此處為一重要地帶。隔黑河之西岸，遠望也有一城，南牆被水沖毀，餘尚全。城由黃土打成。在此地帶，上為石子，下為黃土，蓋當年尚可耕種的。

334甘肅鼎新地灣

在大灣東北十五里。此處本為耕地，稍修河渠即可耕種。惟無人居，遂致荒蕪。

黑水繞其西北二面，城分二層，內層有二城，小城在東，東西長20公尺，南北長21.5公尺。牆厚5.0公尺，高6公尺，方11.4公尺，牆上有土窩及柱痕。門向西，寬2.8公尺，厚5.0公尺。門西為外城，東西寬47.0公尺，南北長54.5公尺。門在南牆的中部，牆厚0.7公尺，高約1.8公尺。第二層城東邊，以內小城之東牆為標準，東西寬97.0公尺，南北失長。但據東南隅33.0公尺，南北全長當為87.5公尺。由內大城之西北角走550公尺處有墩方4.2公尺，外短牆方14.0公尺如凸形，而墩居北中，前人曾在此開坑，其中陶片甚多。當為漢代遺存。另西南40度向前7.0公尺處，亦有一墩甚小。此處本為可耕的農田，現因河渠失修而荒蕪。所謂地灣者就是農田的意思。

335寧夏小方城

地灣東北。該處樹木高大，蘆葦茂密。城畔為一片平地，生有紅柳及短草，想為當年之農田。

小方城即巴個的兒晚經，南距狼猩山20里，該城東山西河地勢險要。城內方12.8公尺，外17.7公尺，牆厚下約3.0公尺，上1.2公尺。門向南，寬3.0公尺，高6.0公尺，城內墊土甚厚，現為蒙人堆柴之所。城之一部由土坯作成，坯長42公分，寬22公分，厚16公分。另一種寬15，長30，厚65公分。牆之另一部由石子打成，牆在一高堆上，此處居延漢簡之大量出土處。

336寧夏大方城

在小方城北。此處無樹木，僅有稀疏之蘆葦及駱駝草，惟以積沙甚多，不若小方城處之優美。

大方城，蒙語爲伊肯的兒晚經。此城爲39.0公尺見方，門向東，寬約5.0公尺。東西南北兩隅各有一向外突出之墩，長約3.0公尺，高約4.0公尺，城牆厚約1.2公尺。每隔3.0公尺有一木杆，後牆正中有一石座，方5.60公尺，高5.5公尺，西北兩面爲河，距城約二公里。據云清代時，草長可沒人，現在均被沙蓋，城亦爲沙積，數年後恐被砂全沒。

337寧夏黑城

在葱都耳東南，隔數沙壠，先由一老蒙人在高處用望遠鏡窺視，先找到了黑城的方向，然後依此方向而往，並無道路。該地在舊河谷裡，僅有紅柳與白沙日相爭長而已。

黑城在兩河交匯處所夾之三角地帶上，所在之地爲戈壁，而左右兩河則皆爲乾谷。城由磚砌成，東西長約466公尺，南北寬約381公尺，牆高約10公尺，有東西二門各有壅城，曲折外出，牆厚下約12.0公尺，上厚僅4公尺，四面均有外出之墩，北面6個，南面5個，東西兩面各4個。四隅各呈圓形外突，建築極堅固而整齊。北牆上有小洞可以出入。西北兩面砂壠高與城齊，城內有街道，有屋基，地面上滿布黑色磁片及碎磚。城頭堆滿了碎磚石塊，仍爲當年守城時所放置者。大建築在東南隅，牆極堅厚，或爲政治區。城外西南隅有一禮拜堂式之建築物，方基圓頂，大門向東。內方5.7公尺，外方9.4公尺，前有門向外突出2.7公尺，南北寬5.6公尺，屋頂高約6.0公尺，門牆高5.5公尺，外後門寬2.6公尺，高3.8公尺，內門寬1.2公尺，高2.0公尺，及左右有窗。大門形制亦極精美，內部白頂如傘狀，圓頂之腰間有四小孔，當爲西夏的建築。外西北部爲寺廟所在，均殘破。1908年俄人科智洛夫所領之探險隊，曾兩至發掘。1914年英人斯坦英所率領之中亞探險隊也往其地發掘。嗣後中法兩國所組織之西北科學考察團亦曾至其地，我們此次考察乃第四者了。

第九號報告提到發現「碎紙」，上引年表中未提。經查石先生的訪問記錄，石先生曾特別回憶到「居延紙」的發現經過。石先生在回憶黑水流域調查第三天以後的部分說到：

在某地的墩休息，順便進行發掘，我們就找到了陶片，還有字紙。字是隸書，就是「居延紙」，是這次調查的大發現。發現之初只知是字紙，卻未想到字體的意義。當地因為少雨，埋藏土內的紙未受風吹雨淋，所以除顯破爛、字跡不完整之外，大體情形良好。鑑識字體是勞先生的專長，經過鑑定，紙上的字是東漢的隸書。這分「居延紙」雖然只是一塊，可是有相當高的價值，現在也收藏在史語所內。^⑨

另據石璋如先生的訪問記錄，我們才知道石、勞在黑城調查之後，限於糧食和氣候因素，並沒有繼續北行到居延海而頗覺遺憾。¹⁰據石璋如先生的年表，他們於十月結束額濟納河沿線的調查以後，又曾在甘州和張掖調查甘州的紅城子和張掖的黑城子和小黑城。這些據年表所附地圖都在張掖的西南郊，因已不在居延烽燧沿線，不俱錄。

石、勞這一次西北考察雖沒有能夠從事正式發掘，也沒有得到多少遺物，但是這是第一次中國學者自行進行西北實地調查，奠定了以後工作的基礎。勞先生親自考察敦煌玉門關、陽關等遺址，又見識了額濟納河沿線漢代烽燧的實況，促使他後來寫下〈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1943)、〈漢簡中的河西經濟生活〉(1944)、〈兩關遺址考〉(1944)、〈釋漢代之亭障與烽燧〉(1948)、〈論漢代玉門關的遷徙問題〉(1960)等重要的論文。勞先生也寫過若干和敦煌石窟相關的文章，在他的文集《中國的社會與文學》(台北：文星書店1964)中最少就收了三篇。石璋如先生將測繪的千佛洞石窟圖和照片帶回給傅斯年和李濟看，大獲二人讚賞，認為是真實的歷史紀錄，值得發表。但是他們更急著要石先生整理殷虛的報告。敦煌石窟的調查資料為此一放五十多年。¹¹

石、勞二人的考察成績和對西北地區調查所作的建議，應對民國卅二、卅三年再一次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生過促進的作用。民國卅二年，中研院史語所的夏鼐、中國地理研究所的李承三、林超、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向達和閻文儒組織了一個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新地區展開調查工作。而就在這次調查裡，夏鼐在石、勞走訪過的敦煌小方盤城掘獲三十餘漢簡。石璋如在《考古年表》表三，卅三年十一月條中說：「三十一年勞榦、石璋如前往調查時，因哈薩出沒，未敢久停，僅開一坑即返。此次再在城外高處發掘，獲有漢簡三十餘根。」(頁28)

^⑨ 《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頁271。

¹⁰ 同上，頁272-273。

¹¹ 參石璋如《莫高窟形》自序，頁2。

結論

這段學術因緣轉眼間已是六十多年前的往事。五月三日見到大病初癒的石先生，他為我描述黑城所見，為何夜宿黑城水缸上放菜刀，又為何沒能到居延海，情節歷歷，一如昨日。石、勞二老在當時必然無法想像，六十年後的簡牘、石窟造像和經卷已經各自蓬勃發展成為專門的簡牘學和敦煌學。二老一步一腳印走在前面，他們的辛勞和成果，應該讓世人都知道。這是撰寫這篇小文的理由。最後容我抄錄一首勞先生的五言古詩〈居延故址〉¹²作為結尾，並祝福二老福壽康泰：

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廢壘高重重，想見懸旗旌。
今茲天海間，但有秋雲輕。歸途遇崎嶇，枯柳相依憑。
長河向天流，落日如有聲。刺草凝白霜，古道紛縱橫。
豈伊車轍間，曾有千軍行。弔古寧復爾，世亂恩清平。
誰為畫長策，贏此千歲名？

91.3.23/5.30

¹² 勞榦，《成廬詩稿》，（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8年），頁5。